

安妮宝贝 主编

大方

O-PEN 新文艺

漫步时间之外
Mind Out of Time

奈保尔

非洲的假面剧

太宰治

Goodbye

余华

给塞缪尔·费舍尔讲故事

弗兰岑

更远

比尔·波特

飘飘歧路间



Summer 2011 No.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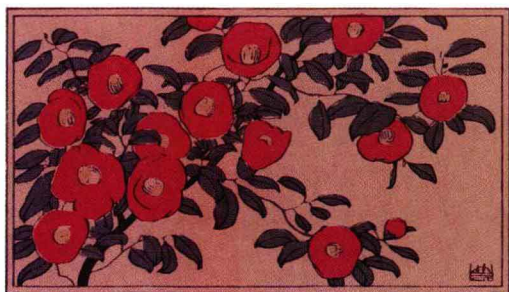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大

O-PEN 新文艺

方

No. 2



安妮宝贝 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方. No.2/安妮宝贝编.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02-1152-6

I. ①大… II. ①安…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2402号

大方 No. 2

安妮宝贝 主编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120

责任编辑 王倩 黄璐

责任印制 李远林 付丽江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2.5

字数 288千

版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02-1152-6

定价 25.00元

大方 OPEN 新文艺

主 编 安妮宝贝

编 委 马家辉 止庵 叶美瑶

安妮宝贝 胡朗

编辑总监 林妮娜

编 辑 黄宁群 侯晓琼 黄渭然 艾可

设计总监 韩笑

美术编辑 杨兴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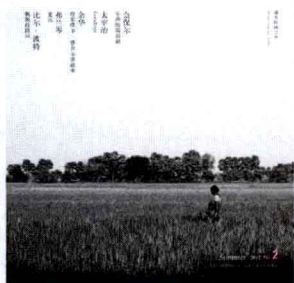
营销总监 张卫平

出 品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出 品 人 陈明俊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大方



目录 Contents

随笔	非洲的假面剧 V.S. 奈保尔	7
	更远 乔纳森·弗兰岑	74
	飘飘歧路间 比尔·波特	164
	从美丽岛到龙的传人 马世芳	180
小说	Goodbye 太宰治	188
	战地女郎 钦努阿·阿契贝	26
	米德兰的下午茶 大卫·康斯坦丁	91
	与作 董启章	94
	沙之书 陈雪	111
文本	给塞缪尔·费舍尔讲故事 余华	35
	未来之城 胡晴舫	119
专栏	在印度 安妮宝贝	41
绘本	The House in the Night 苏珊·玛丽·斯万森	127
	贝斯·克罗姆斯	

Contributors

V. S. 奈保尔 (V. S. Naipaul)

英国作家，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诺贝尔文学奖和两次布克奖的获奖者。代表作有小说《河湾》《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等。2010年10月出版最新创作的游记《非洲的假面剧——非洲信仰面面观》(*The Masque of Africa: Glimpses of African Belief*)，从乌干达、加纳一直写到南非。《非洲的假面剧》系其中的南非部分。

钦努阿·阿契贝 (Chinua Achebe)

尼日利亚作家，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代表作有《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战地女郎》选自短篇小说集《战地女郎及其他》(*Girls at War and Other Stories*)，作者以冷峻的笔触，记述了战争对平民造成的悲剧性毁灭。

余华

生于浙江。代表作有《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等，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近三十个国家出版。《给塞缪尔·费舍尔讲故事》是他应德国费舍尔出版社邀请，为纪念出版社成立125周年所写的。

安妮宝贝

生于浙江。著有《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纪》《莲花》《素年锦时》，2011年合为“十年修订典藏文集”。《在印度》是她最新的游记，以独特的文字与摄影，展示了印度人生活和信仰的一个侧面。

乔纳森·弗兰岑 (Jonathan Franzen)

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纠正》《自由》，2010年《时代周刊》誉之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更远》(*Farther Away*) 首刊于2011年4月18日《纽约客》，他带着《鲁滨逊漂流记》和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骨灰，来到一个无人岛，对孤独、自我、自由等一系列命题进行了反思和探问。

大卫·康斯坦丁 (David Constantine)

英国当代诗人、翻译家和小说家，荷尔德林、布莱希特、歌德、克莱斯特等人诗作的译者，著有诗集《守候海豚》《碧玉房子》《关于鬼魂》，小说《戴维斯》《小屋》等。短篇小说《米德兰的下午茶》(*Tea at the Midland*) 获2010年英国BBC国家短篇小说奖。

董启章

生于香港。著有《地图集》《体育时期》《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等，后两书分别获得第1届和第2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他本人获“2008香港艺术发展奖”年度最佳艺术家奖。《与作》是他的短篇小说新作。

陈雪

生于台中。著有《桥上的孩子》《陈春天》《附魔者》等，其中《桥上的孩子》获得2004年“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奖，《附魔者》入围第34届金鼎奖。短篇小说《沙之书》曾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少量印发，此次重新修订、正式发表。

胡晴舫

生于台北，现旅居日本。著有《旅人》《她》《办公室》等。《未来之城》写于日本3·11地震之后，探讨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苏珊·玛丽·斯万森（Susan Marie Swanson）

美国诗人、绘本作家。作品《妈妈告诉我的第一件事》获《纽约时报》最佳插画作品奖及夏洛特·佐洛托奖。受《这是王国的钥匙》等传统童谣的启发，她创作了《夜下的房子》这首诗。

贝斯·克罗斯（Beth Krommes）

美国插画家。作品《灯，冰块和名叫“鱼”的船》获金风筝插画奖及蓝丝带奖，《蝴蝶的眼睛和草原的秘密》获亨利·伯格童书奖。2008年与苏珊·玛丽·斯万森合作的《夜下的房子》（*The House in the Night*）获2009年凯迪克金奖。

比尔·波特（Bill Porter）

美国汉学家、翻译家，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等译为英文出版，并将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旅行见闻写成《空谷幽兰》《禅的行囊》等作品。《飘飘歧路间》是其新作，别出心裁地解读了寒山与韦应物的诗歌。

马世芳

生于台北。电台节目主持人，著有《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等。《从美丽岛到龙的传人》借民歌的演变，勾勒了两岸的音乐脉络和历史轨迹。

太宰治

日本“无赖派”作家，著有《斜阳》《维庸之妻》《人间失格》等。生于1909年，一生五次自杀，1948年终于与山崎富荣在玉川上水情死。在日本，太宰治迄今仍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Goodbye》系未完成的绝笔之作，首次译为中文。



非洲的假面剧

V.S. 奈保尔 文 郑云 译

1

正值南非冬季。约翰内斯堡四周的高地空气干燥、草木枯萎。机场外，蓝花楸树（我已认得此树）已经发黄。这儿似乎没有任何热带非洲的迹象，周遭的景致倒像是遥远的北方（伊朗或卡斯蒂利亚）那寒冷的冬季。通往这座大城市的路旁笔直排列着工厂厂房，它们属于科学与金钱的文化，是另一个大陆、另一种文明的形态。在这种背景的衬托下，路旁的非洲工人乍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但渐渐地也就觉得顺眼了（尽管猛烈的日光把他们的肤色晒得格外黝黑、富有光泽）。

两天后，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我目睹了一个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城区的状况。由于担心隔离结束后的影响，白人们早已搬离此地，而非洲人顺势迁进：他们并非本地人，而全都是些游民，来自南非周边的国家，如莫桑比克、索马里、刚

果和津巴布韦。当初，自由南非政府在一阵非洲化的浪潮中将其边境向这些人开放，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住进了这座高大坚固、永不倾颓的城市一隅，将高楼大厦与通衢大道变成了贫民窟——或至少是不怎么体面地过活着。很难想象当这些大楼还发挥着原初功能的时候，他们是以何种方式在这里生活的。路旁，实心的玻璃窗上有被人砸开的痕迹；一栋办公楼（又或许是公寓楼）自下而上挂满了正在晾晒的破旧衣裳。

杰出的南非作家里安·马兰（一九五四年生）曾经指出——马兰的作品向来不事浮夸与虚假，时常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方式，试图阐释他的祖国所经历的种族苦难——在非洲，白人为了他们自身的文明建造了一个月球基地；当其土崩瓦解之后，黑人白人皆一无所获。

四十年前，在卢旺达的基伍湖滨，我曾目睹一处比此地简朴得多的比利时度假村被森林及森

林居民毁坏。他们原本很高兴住进现成的寓所(包括现成的房顶、现成的墙壁和坚实的地板),可没过多久就不高兴了:他们不喜欢比利时房屋的矩形构造,逐渐着手将其改造成自己所熟悉的圆形空间——他们世代所居棚屋的形状。若干年后在刚果,我还见过一座城市(当时叫斯坦利维尔,现称基桑加尼)整片的住宅区被森林居民侵蚀。四下里,但见褪色的街牌依然在指点方向,街道的格局却已经万难辨认了。

约翰内斯堡的这一城区,尽管带上了科技、时尚与建筑的烙印(且和约瑟夫·康拉德在刚果河边的一个棚屋里所发现的神秘教科书一样,还标示着学识与奉献),但它给我的印象与基桑加尼的林区如出一辙。我不由得想起我所见过的其他废墟之地。例如,战时东柏林的瓦砾堆在共产主义时期被当做纪念碑保存了下来。然而,若要重建东柏林那片废墟,即便是在艰难年月,也要比将约翰内斯堡的这片混乱区域基本恢复原样容易多了。在这儿,人们该从何处入手呢?恐怕不得不从城市及文明的理念开始切入;而且不等重建开始,抗议声就会淹没一切。

那处新贫民窟内还有更多东西有待发现。一座坚固的老仓库如今已被新的货品占据,恰似对此地原有功能的一出戏仿。现在这里是一处规模庞大的灵药市场。巫医们指令顾客来此地购买商品,以供他们施法时使用——多数是用来制药,给那些不幸着了魔障的男男女女服用。在这些林林总总的魔力商品当中,最能让我们接受的当属那些用药草编织的花环了。它们可以用来香薰住宅,使恶灵不得在内安生。较之更为庄严的物品则属那些裹挟着泥土的根茎。它们可能被用于涤除罪恶的仪式——这是非洲巫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接着,我们进入了骇人的王国:一张平台上

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动物器官,旁边的矮凳上坐着一名小贩。市政规章使灵药市场更加有序地运作:货品晚上就存放在市场内,小贩们不必每天收摊撤货,次日一早再搬回来。在这类货品的展示方面,我们面前的这个小贩是个能手。他能将迥然不同的几样东西一字排开(比如一块下颌骨和一根肋骨),并使它们看上去有所联系,或同属一个系列。在展台的最左上角,这个最最傲人的(显然也是最珍贵的)位置,摆放着三个马头;头上毛发犹存,表明它们是从屠宰场新鲜运抵的。它们可没那么容易搞到。假如巫医指令某人来买马头,那就意味着他将在购买者身上施行最顶级的巫术——显然,马头是相当昂贵的魔法药引。(不过也许还比不上白人妇女的乳房那么贵。据警方透露,乳房曾被当做灵药出售。)

我本想问问这些马头的要价,但又有些不敢多问。我已问了无数问题,小贩已然觉得我毫无诚意,眼看就要大发牢骚。他对其存货质量及摆放艺术颇为自豪。每天,他都会遇着几个像我这样的闲人或访客,向他询问各样东西的用途,却丝毫没有要买的意思。这样做纯粹是在浪费卖主的时间,还指望对方始终都把自己当回事。

马头之外,还有几个鹿头。它们被尖刀或利斧从中间一记劈开,让人想到收获季节在可可园里发生的情景:左手握着可可果,右手用砍刀将其劈成两半。劈开鹿头时,下手要干净利落,如此方能把那可怜动物的脑髓从颅内取出售卖。这一击是如此神速,吻部极薄的鹿头仍将精致无损,甚至拿到市场上贩卖时,那双眼看上去依旧炯炯有神、毫无惧色。

臭气扑鼻而来。除了在小贩的台面上平铺着各种动物器官,绳子上还展示着织物一般的动物肠胃。这样,熟谙动物各部分功用的老手就能尽情挑选或检视他所需要的部分。展品呈白色或灰

白色，血色尽失、尘土满布。

此外，小贩的笼子里还关着两只豚鼠。它们饱受死亡气息的折磨，紧紧地挤在一起，彼此以体温与活力作为短暂的慰藉。小贩觉察到我的担忧，大声声明它们是他的宠物。他可真逗。事实上，这两只豚鼠被卖掉以后，将会按照一定的规矩进行屠宰：用小刀径直剖开心脏——这会令豚鼠极其痛苦，人们却偏爱此法——然后，人们按照巫医的指导，喝下它们的鲜血。这是牺牲仪式的一部分。

这一切让我感觉糟糕透顶、失望万分。南非人曾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本以为，艰苦的斗争会造就伟大的民族，而其各种魔法仪式将会指引人们走向某条更为光明的大道。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可能认为，美德会来自这些凄惨的动物遗骸。同样，任何有理性的人也不会认为，当地巫师所施行的巫术，对于平复这座大城市及被严管的附属黑人聚居区对其居民所造成的伤害有任何帮助。这里缺乏我在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中发现的美——在我看来，他们对自然界极为崇拜——也没有加蓬人与雄伟森林能量相通的理念。这儿只有最简单、最平庸的巫术，生发不出任何美好，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就在几小时前，在种族隔离博物馆，我还体味到另外一种非洲之痛。这两个非洲彼此隔绝，无法合二为一。当你开始观察时，总会从一个非洲摆动到另一个非洲，从一种思绪摆动到另一种思绪。我最终感悟到：政治与历史的合谋，造成了南非人的平庸。

灵药市场的不远处便是卜算街。那儿的铺子相当狭小，柜台及给顾客坐的长凳占据了占卜室的大部分空间。在第一间铺子里，有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来给她出生不久的小女儿求药——她们显然是艾滋病患者，但我无意上前问询。她给了医

家一百兰特。不一会儿，对方就带着四十兰特和用报纸包着的一包草药（或曰药粉）回来了。可怜的瘦女人高兴极了，以为这下她的小孩可得救了，真教人心酸。路对面是另一家同样逼仄的占卜室，屋里一片昏暗，唯有两副烛台照明。卜者低身蹲伏，叫我们投掷骨头——几个月前在尼日利亚，我们也曾在类似的狭小空间做过此事——然后她为我们解读征兆。

外面停着几辆警车。我们的司机过去跟警察们聊天，回来时说，警方正在追捕亡命之徒，来此是为了弄点儿防身之物。

2

种族隔离博物馆的一面墙上，刻着几部种族镇压法令的名称。它们曾被用来维护这个国家的秩序。现在，隔离虽已废除，但它持续的时间毕竟太久：三十六年，足以养成整整一代在这套侵犯性法令下成长起来的人。法蒂玛，我们的导游兼旅行策划，便是其中一位。换做一般人早就被时局拖垮了，但法蒂玛有文学上的抱负，这一可贵的理想使她保持了自我。她曾经向往外界的其他文化——起初，她向往伊斯兰世界——尽管这一梦想后来误入歧途，但终归还是对她有益的。

刚见面，她就告诉我们，她是个“有色人”。这是个南非词汇，可以单纯用来形容某人具有混合血统。但其实它还另有一层意思，暗含侮辱意味。该词源于遥远的过去，暗示着你有一名布须曼人祖先。南非的布须曼人就像加蓬的俾格米人，体格矮小，被认为是当地最早的原住民，熟谙草木及毒药等各种知识。金山大学的“起源中心”里一刻不停地播放着有关布须曼人的短片（由于反复播放，胶片已满是划痕，放映起来沙沙作响）。

片中的布须曼人载歌载舞，用可怕的方式毒杀并猎获巨大的大角斑羚。

她母亲的祖父辈中有个英国人，曾外祖母则是科萨人。法蒂玛主动声明自己是个混血儿（这正是种族隔离法炮制出来的怪事），但她见过曾外祖母的照片，自认为是个十足的科萨族女人。法蒂玛的祖父肤色黝黑，但他们全家都讲阿非利堪斯语，厌恶黑皮肤。法蒂玛去看望祖父一家时，他们把她带到美发师那儿，愣是把她卷发里的发结给拉直了，让她看起来较像个白人。

因此，她从小到大都“只是个混血女孩”，不具任何归属。学校里的科萨族女孩都有身份，而她却一无所有。她在有色人种的社区长大，邻居中有穆斯林。她看到他们过宗教节日，行宗教仪式，拥有完整的穆斯林身份。毫无疑问，正是为了攫取这种身份，她二十岁时就嫁给了一个穆斯林神职人员。从此，她一心投入伊斯兰教的怀抱，可谓死心塌地。她开始“遮盖起来”，起初只是戴头巾，不久便紧裹全身，只露出脸和双手。一开始是她主动这么做，可后来，她丈夫的要求越来越多：他不喜欢她跟别的男人同乘出租车，也不喜欢她和别的男人握手。他威胁要和她离婚。她的记者工作变得难以为继，她的伊斯兰身份之梦也就此落空。一番挫折后她前往德班，试图依附那儿的印度人群体。可他们并不友善，非要弄清她的姓氏和出生的村子。每当他们盘查清楚她是个有色人，便毫不留情地将她拒之门外。她读了大量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比那些测试她的印度人和穆斯林都更有学识，但这无济于事。她去麦加朝觐，却感到一片茫然，所获的只有加在她这样一个女子身上的桎梏而已。

此后，她又开始寻求黑人的身份，但依旧困难重重。有色人的出身再度成为障碍。黑人们拒斥她，觉得她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文化根源的

人。因此，她的这趟南非之旅乃是一段痛苦的发现之旅：从有色人的出身到伊斯兰之梦，到德班的印度人，再到聚居区的黑人。在德班也有黑人聚居区，但都在机场附近，她没能见着。等来到约翰内斯堡，她才看清了这些聚居区，并开始和黑人人们一起工作。直到那时，她才真正明白了黑人的痛楚，并由此悟出，对于非洲人来说，所谓“政治自由”及“种族隔离已然结束”全是一派谎言。

法蒂玛说：“我发觉，南非这儿的黑人比白人更愿意伸出手来。那些白人只想让黑人‘离远点’，别靠近他们。他们不愿合作，也不愿和解，只想跟黑人保持距离。他们满脑子都是成见，比如索维托很危险、交黑人男友很糟糕之类。”

在我动笔之初，我曾想避开政治与种族的话题，试图在它们之外寻觅非洲人信仰的本质。可就像寻求身份归属的法蒂玛一样，我的这种尝试也在南非遇到了困阻。我意识到，种族问题是这儿的头等大事，正如其他地方的宗教问题一样根深蒂固、无从回避。

3

种族隔离博物馆让我见识了南非人的历史观，确实触动人心；不过，从约翰内斯堡到比勒陀利亚的城际公路尽头有座更宏伟的建筑，这便是为纪念十九世纪前半叶布尔人从开普殖民地向内陆“大迁徙”而建的先民纪念堂。那次迁徙是为了摆脱英国人的统治，他们随身带着所有的物品与牲畜，一路坐着牛车，行程想必漫长而艰辛。这些迁徙者并不总能预见自己将要面临的处境。非洲人对他们并不友好；许多迁徙者死于征途。法蒂玛上学时被要求学习这段历史：途中的所有

小型冲突都升级为战斗，而所有这些战斗都必须牢记于心。然而，吊诡的是，她却不被允许参观这座纪念堂。

这座褐色的花岗岩纪念堂坐落在山顶。从路上远眺，仿佛山丘的一处隆起。它是一座单体建筑，没有比真人还大的英雄塑像。游客从后面的花园步入，先仰望一下它那伟岸的高度，然后拾阶而上直达主层。入口处倒有一尊比真人还大的绿色青铜雕像，是一名戴着头巾的坚强妇女，护卫着两个紧紧依偎她的孩子。这尊感性的雕像与纪念堂的那种三十年代持重的日耳曼风格有些格格不入：这座纪念堂正如众多的装饰派艺术建筑，有点儿像一台放大版的三十年代收音机或电唱机。外墙上，六十四幅浅浮雕牛车图案构成了环形车阵，象征性地保护着纪念堂。要紧的是六十四这个数字。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当迁徙者遭遇祖鲁人的袭击，他们就用了六十四辆牛车组成防御阵地。祖鲁人最终惨败。纪念堂纪念的正是血河之役的大捷。

穿过柚木大门，纪念堂内的圆形空间凉爽而美丽，四面各有一扇高大的拱窗提供光照。带有花岗岩框椽的窗子嵌在四根立柱之内，奇异地呈现出一种伊斯兰风格。弧形的墙面上，与视线齐平的是二十七块浅浮雕饰板，记叙了迁徙途中的驻地和战役的胜负。应该说，浮雕上的非洲人并没有被丑化嘲弄。他们或多或少袒露着身躯，看上去比迁徙者们更具英雄气概——后者身着十九世纪式样的衣裤，在雕刻中的效果远不及裸露的躯体。

所有这些已足以给人深刻的印象，但还有别的。主厅下面的几层展厅展示的是与大迁徙有关的各种艺术品。纪念堂于血河之役一百年后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破土动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二十五万人面前，丹·弗·马

兰宣布纪念堂正式开放，其时恰逢他和他的国民党政府所制定的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颁布整整一年。这是座阿非利堪人的纪念堂，记录了非洲人被征服的历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法蒂玛那样的人不得入内参观了。

建筑师杰拉德·摩尔迪耶克曾说，他已造就了一座能历经千年的丰碑。他本应出言更谨慎些。在南非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地方，人们太容易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一面，并致力于根基不稳的事业。时代自然已经变了。摩尔迪耶克建造的阿非利堪人纪念馆如今已变成国家纪念馆，并作为国家遗产的一部分而得以保留，但没人能确保将来。

4

里安·马兰介绍我读一读阿非利堪作家赫尔曼·查尔斯·包斯曼的作品。我走之前，他送给我一本《马菲京路》，是这位作家的四本短篇小说集之一。这本南非的出版物上没有提到作家的生平与生卒年月，因此我感觉自己是在凭空瞎读。只有一句引自罗伊·坎贝尔的引文透露少许信息，其人已去世多年。包斯曼的天才令人自叹弗如。他描写十九世纪末期心智单纯（或曰愚钝）的布尔乡野村夫，故事渐次展开、彼此相连，勾勒出一个整体。作者文笔平直，能够从容描绘各种丰富的情感。他行文诙谐，简练的笔触造就极美的文风。有个故事，讲的是一只豹子忽然出现在叙述者的面前。它几乎要嗅到他的脸上了，让人捏把冷汗，接着却变得像只小狗那样温顺。叙述者随后四处夸耀这只豹子，但邻居们不相信他。一天，叙述者看见那豹子像只狗似的睡在路上，脚爪交叉着。走近一看，才发现它的胸口已被毛瑟枪击中。毛瑟枪是当地村民的主要火器。叙述者

的夸耀和那些愚鲁乡亲的残忍，最终导致了这只神奇动物之死。

集子里最重要的一则故事是关于一次模拟的大迁徙。从开普殖民地出发的大迁徙已成了这些淳朴乡民的平民智慧的一部分。在他们的想象中，人人皆可尝试迁徙。在布尔战争末期，眼看败局已定，费不了多少工夫就能让他们相信，假如驻留原地便将受到英国人的奴役，唯一的出路是迁往自由的纳米比亚——德属西南非洲。在那里，他们将会遇上与自己更为相像的日耳曼人。迁徙之路要穿越可怕的纳米布沙漠，这群人中没有几个了解沙漠，或懂得在沙漠中寻找水源，可他们愚蠢地低估了自己将要面对的困难。

与先民们一样，他们把家什装上牛车，踏上迁徙之路，而灾难几乎立刻降临了——包斯曼落笔从不拐弯抹角。牛群只喝过一次水，就再也没水了。后来终于找到一口浑浊的水眼，可饱受折磨的牛早已跪地不起，既喝不到水，也站不起来了。才走了两三天，这些迁徙者就已精神恍惚，自欺这趟沙漠之旅已经成功在望。一天早晨，他们发现自己的非洲仆从都逃走了，这等于判了他们死刑。故事娓娓道来，包斯曼轻描淡写的节制笔触巧妙地升华出这一可怖主题之下的苦痛与尊严。一些原本想要迁徙的人决定撤回，然而，出人意表的是，尽管现在人人都清楚，当初这个穿越沙漠的决定是个可怕的错误，但试图回撤的人还是莫名地失去了他们的道德威望——因为他们灭了自家的志气。带头提议迁徙的那人发了疯，一意孤行。后来，当幸存者回去清点失踪人数时，协助寻找的贝专纳土著发现他早已一命呜呼。

我把包斯曼写的故事与先民纪念堂归为一类，因为它们同样具有未被厘清的含混主题。先民纪念堂并非只与大迁徙有关，还关乎非洲人的痛苦与失败。纪念堂本身是件立意高远的艺术品，

建造历时十一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便已耗资近四十万英镑，方方面面无不考虑周详，但它所纪念的主题却令其陡然失色。

包斯曼的短篇小说也有些类似。出色的叙事却未能阐明其根本的主题。这些人并不仅仅是淳朴的乡民，他们头脑简单、缺乏想象力，却给非洲人带去了难以言说的痛苦。人们或许会说，包斯曼不过是如实记述，以朴实的文笔写下一切，而由读者自由地加以阐释。但他恐怕有些太过不动声色了。里安·马兰认为，包斯曼能与马克·吐温相比。问题就出在这儿。就拿哈克·费恩那骇人而荒唐的父亲来比吧，那是个绝妙的喜剧人物。相形之下，包斯曼的书里找不到那种有血有肉的感觉。那是一种更为精妙丰满的文笔，非包斯曼所能企及。

5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位真正的伟人曾在德班、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等地游历。他的旅行——某种程度上是大迁徙的现代版本（乘坐火车和马车）——可说是一场受难之旅。旅行改变了他的生活，开启了他将毕生从事的事业。只不过，那项事业是在印度而非南非；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都没有他的纪念碑。这位旅行者便是莫罕达斯·甘地。他的受难之旅始于一八九三年，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他来到南非。尽管由于家族的关系，他是作为一名富有的印度穆斯林商人的律师来到此地的，但他几乎还没有任何阅历可言。

他只在孟买的小案法庭出过一次庭，打的是一件三十卢比（合两英镑）的案子。没有哪桩官司比这更小的了，可对甘地来说，这件案子却是



个耻辱。开庭时，甘地站了起来。他本该质询对方，却腼腆得完全语塞。于是，他所能做的就只有坐回原处，请求将本案移交给帕特尔先生（费用五十一卢比）——律师席上的另一位律师。帕特尔先生利索地解决了这起诉讼，拿到了他的律师费，而甘地羞愧得甚至不愿查明自己的前事主（一位妇女）是赢是输。从此以后，作为律师，他所能做的似乎就只有远离法庭，写写诉状了。

这算是个糊口的营生。但随后，家族的一位朋友向他提供了一份去南非的差事：一年的工作期，头等舱的来回船票，拢共一百零五英镑薪水，食宿全包。甘地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种条件下他更像个仆而非律师。想必他也意识到，那些生意人根本瞧不起他们当律师的，但他并不介意。他喜欢冒险闯荡，并不计较报酬。

起初的确像是一场冒险：漫长的海上旅行——从拉穆途经蒙巴萨、莫桑比克，最后到达德班。他在德班见到雇主，雇主告诉他，这里其实并没有太多事情要他干，公司相当于花钱买了头白象¹。甘地发现，他要处理的那桩案子与账目密切相关。他买了本书开始研究，不久就掌握了所需的知识。

八天后，甘地拿到一张去北面比勒陀利亚的头等车票。雇主认为他应该再花五个先令买张卧铺。但甘地却宁肯省下这笔钱，并觉得这种固执和节约能带来一切——尽管现在很难理解他当时为何会这么想。他的受难之旅从此开始。路上每一站的地名——马里茨堡、查尔斯顿、斯坦德顿；甘地在三十年后口述自传时依旧记得一清二楚（尽管它们在当代地图上未见得全部幸存）——

也都充满了羞耻、害怕和侮辱。他所受到的虐待和暴力甚至使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安然抵达目的地。

在马里茨堡，列车员问甘地是否需要一个铺位。他说：“我自己带了铺盖了。”尽管没在自传里明说，但他相信这就是噩梦的开始。先是来了两个官员，接着又来了一个。正是这第三个告诉甘地必须挪到行李车厢去。甘地断然拒绝，说如果非要他离开就只能有劳他们动手了。那个官员叫来了警察，警察将甘地和他的行李全部扔下了车。甘地随后安顿下来，打算熬过一宿。天相当冷。他行李中有件大衣，但他想，如果他去讨要大衣，必会遭到羞辱。²那一晚，他想了很多。他该回印度吗？还是该留下来斗争？他应该将侮辱置之度外，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吗？他想他应该留下来，反抗种族偏见这一痼疾，即便吃苦也在所不惜。认真思考之后，他决定搭乘下一趟火车前往比勒陀利亚。

假如那就是他在危难关头的表现，他就不是甘地了。可他到底是甘地——撇开别的不说，他首先是个讲规矩、讲法律、对法律有虔诚信仰的人（虽然那时还谈不上对信仰本身的信仰）。次日早晨，他拍了封很长的电报给铁路公司的总经理。随后，他又坐上火车（拿着他原本拒绝购买的卧铺票），来到了查尔斯顿。在那里，受难还在继续。当时，查尔斯顿与约翰内斯堡之间没有铁路，只有一趟公共马车，而那个马车领班纯粹是个恶棍。他刁难甘地，不许他坐进车厢，接着又叫他从车夫身边的座位换到踏板上去。他凶恶地殴打甘地，以致激起了乘客的公愤。

马车当晚停在斯坦德顿小镇（现在，大一点的地图上都不标注这个地名）。有些印度人在那里等候，是雇主派去接他的。甘地得到保护，便利用这段间隙给马车公司的代理人写了一封长

信，并收到了鼓舞人心的回函：接下来从斯坦德顿出发的马车将更加宽敞，而且那个凶神恶煞似的领班也不在车上。傍晚，关照他的那些印度人送他上车，帮他找了个好座位。他终于安全抵达了约翰内斯堡。至于从约翰内斯堡到比勒陀利亚的最后一段行程，他坚持以律师的派头，必须乘坐头等车厢。他事先写了个条子给火车站站长，告诉他自己的姓名与职业。随后，他穿上礼服、打好领结，亲自前去买票（票价一英镑；甘地在南非所拍的一张照片上就是这副行头。假设他衣服数量有限，很可能那就是他去约翰内斯堡车站购票的装束）。然而，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当我们已准备好迎接麻烦时，却往往什么事都不会有。他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售票房里的那个人不是南非人。他来自荷兰，殷勤有礼。

当时的甘地还信奉大英帝国。在他看来，在南非的印度人之所以备受歧视，是因为他们对政治漠然，既没有提出政治诉求，也没有组织起来。当他完成了在南非的法律事务（他说服了争议双方接受仲裁），便准备返回印度。他来到德班等待客轮。就在那儿，他在当地的报纸上读到一则有关印度人选举权的新闻：一项议案摆到了纳塔尔的立法机关面前，意欲剥夺该省印度人的选举权。甘地颇为惊讶，与他交谈的印度富商们却对此既不知情，也不特别关心。这更令他惊讶不已。富商们草草地讨论了一番，决定将抗议的重担托付给甘地。

因此，甘地推迟返回印度，之后又一再延期。他逐渐认清了印度人的软弱无能，在南非的一年行期最终延长至二十年。他来南非时还很年轻，只是个会写写诉状的律师，没有经过历练，腼腆得可笑。而离开时他已步入中年，当年的青涩律师蜕变成了圣雄，政治手段也已臻完备：非暴力不合作、斋戒，以及他自己的精神境界。

这一切都始于那趟糟糕的旅行：从德班启程，经马里茨堡、查尔斯顿、斯坦德顿、约翰内斯堡，到比勒陀利亚。四十八小时内，就像脱去罩衫那样，他褪去了胆怯。年纪轻轻的他成长为众人的领袖。不少欧洲人，尤其是德国犹太人，都曾在约翰内斯堡帮助过他。想必这对他是个启示。他的理想本只局限于印度，但外界的支持与鼓励使他不再目光狭隘，而能在政治及宗教方面放眼世界。他后来写到约翰内斯堡时充满爱意。不过，话又说回来，甘地和非洲人相处得并不融洽。他觉得很难理解他们，没法把他们融入自己的世界图景。

甚至在查尔斯顿坐马车时的危急关头，他还用了霍屯督这一刻毒的字眼来指称马车领班的非洲仆从——他就坐在车夫另一边。这个词从甘地嘴里吐出来真是奇怪，因他本人始终抵制种族偏见。不过对此或许有个解释：甘地当年是用古吉拉特语对他的古吉拉特秘书马哈迪夫·德赛口述其自传的。德赛随后将口述译为英语。霍屯督可能是英文字典用词，德赛偶然查到，把它当成了“非洲人”的近义词。

6

你能在约翰内斯堡逛上好一阵，欣赏林荫大道、轿车展厅还有公园，却看不到黑人聚居区。你当然知道它们就隐蔽在那里——有那么多描述它们的文字——但当你第一眼见到它们时，仍会惊讶万分：千篇一律的砖头或混凝土小屋一行行地笔直排列，小小的院落里连棵树也没有。而等你深入到情况更糟的地区，齐整的屋舍就被简陋的旧铁皮棚屋所代替，上头草草地涂着个号码，以资辨识。人们竟能在这样的住处生息繁衍，着

实让人吃惊，但他们的确如此。这让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名言：“除了鬼门关，人们什么关都闯得过去。”

等到尘世间的生命结束，就要踏上去阿瓦隆公墓的路了。这公墓居然以亚瑟王的骑士们的墓地来命名，还真是会开玩笑：绵延数英亩的低矮墓碑仿佛是小屋式样的重现，以这种方式完成了生死的轮回。周六是这里举行葬礼的重要日子。开往公墓的汽车一路闪烁着警示灯，宣示自己正在执行庄严的使命，需要优先通行。警示灯只需轻轻一拨便能打开，可不知怎地，豪车、拥挤的车流加上跳动的灯光，造成了一种欢快的效果，人们还以为司机们周六心情大好，一边开车、一边拨弄着车灯开关玩呢。

去往公墓的路边墙上刷满了殡葬从业人员的姓名。在这里，丧葬是桩大买卖，一向生意兴隆，每周六都会来新顾客。身处阿瓦隆的旷地，明亮的天空下，你能看到一群群身着深色套装的男人和穿着红白两色服装的女人。他们的站立之处标示了新的墓穴和新的葬礼。墓地的土呈红色，且布满石块。有时，距墓穴不远处会搭起一顶小帐篷（平顶、四面敞开），我猜那取决于葬礼的规格和殡仪员收取的费用。帐篷底下（并不能真的遮阴），逝者的女眷坐在椅子上，有些身上还披着毯子。法蒂玛说，毯子在这里是一种仪式装束，其原型是从祭献的牛身上剥下的牛皮。牛皮有时会被用来包裹逝者，让遗体保持温度。

新的墓穴互相挨着，泥土堆成的坟冢令人伤感。每个墓穴都临时用木片标明墓主，等日后再换上墓碑。许多墓主都是年轻人，可能死于肆虐此地的艾滋病——当地人民苦难史的新篇章。

有感于阿瓦隆公墓的广阔以及它所承载的巨大不幸，我想起了法蒂玛（以及别人）对我说过的话：没有了种族隔离，南非在这世界上就失去

了根由——再没有什么可供南非作家挖掘、引起他们关注的东西了，也没有了对失败或悲剧进行创作的实在动力。难道说，除了显而易见的种族隔离，就没有更深刻、更普遍的写作主题了吗？就没有保持纯真、与众不同的事物了吗？这似乎不大可能。戴·赫·劳伦斯（随便举个例子）就可以撇开诺丁汉郡的煤矿，而去思虑整个英格兰（尽管内心里他还一直比较局限），进而又思虑整个世界。但南非的作家不是这样，他们仍被束缚在自己的火轮之上。

我曾问法蒂玛，她是否认为人们会有所改变。

她说：“当局想要百姓搬迁，可大家不肯，用的还是跟从前一样的理由。种族隔离的苦水又倒了出来，以此搪塞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当你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时，就打那张牌。它也是我们电影产业的支柱：‘我们曾是黑鬼……’”

我想知道，当她在阿瓦隆看见那些身披毛毯的妇女以及在墓地上跳舞的送殡者时，她作何感想。我所见的于我都是新鲜事物。我觉得，其他人对此也一定有某种更为直接而切身的感受，而不是只想到什么种族隔离。

她以非常坦率的方式答道：“它让我想起了过去，想起我那穿着红白两色服装的祖母。它也让我记起，即便身为基督徒，你也要为祖先奉上一头牛作为牲宰。在有些地方，人们祭上公牛或母牛，并用牛皮裹着遗体下葬。那牲口必须大声号叫，好让祖先们听到。但我可办不到。当我祭奠祖先时，我没法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山羊被活活宰杀。”

这种宰杀牛时要让它痛苦号叫的观念是如此残忍，让我不由想起象牙海岸的人们杀猫的方法：把猫塞进袋子，然后丢进沸水。正如象牙海岸人杀猫来吃的手段让那个国家别的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南非人让牛号叫着赴死的手法也令这里其

他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7

在南非，黑人就意味着继承，或至少有那种可能性。而作为一个敏感的白人，则会对自己在新体制下的位置感到困惑。而且局势很快就变得无比艰难，教人不得不开始思考生存这个严峻的话题。

科林就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他说：“想要无所顾忌地说话，简直太难了。人们之间完全缺乏交流。我感觉现在自己都没法说话，只能没完没了地应付困局，根本没时间停上一停，想想眼下的时局和对策。我希望能找到某样东西倚靠，就想到了人道主义。然而，你只能找到一些致力于人道主义的非洲人，却没法享有人道主义的非洲。而这话你又不能明说。我只能担惊受怕、麻木不仁地活着。这种压抑感是活生生的。回首往日，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正义斗争。我坚持斗争，因为我本身就来自一个充满冲突的家庭。虽然那一切已成追忆，但现在我还靠它支撑着。”

科林家的冲突源自他不同的祖先。他半是英国人，半是阿非利堪人。外祖母向他讲过许多有关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所建集中营的故事。他能理解阿非利堪人对集中营的愤懑，但同时，通过父亲，他对英式自由主义也有一定的好感。十二岁时，科林被送到一个乡下小镇，和一个叔叔住在一起。那里的种族隔离不像其他地方那么严重。科林和一个同龄的黑人男孩弗朗茨成了朋友。这份友谊对科林的心智发展十分重要。他说：“我把弗朗茨与我之间的友谊视为弥足珍贵的人性时光。”科林能够如此谈论，因为他是完全当真的。

他把城里的情形说给弗朗茨听，而弗朗茨则